



中国经济文库·应用经济学精品系列（二）

邵传林◎著

制度变迁下的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研究 ——自农户视角观察

A Study on the Rural Informal F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s in China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变迁下的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研究:自农户视角观察/邵传林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136-3420-5

I. ①制… II. ①邵… III. ①农村金融—研究—中国 IV. ①F83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6417号

责任编辑 姜*静
责任审读 姜*静
责任印制 马*静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艾普海德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22

字数 324千字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

定价 49.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8179号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68355416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12390)

服务热线:010-88386794

自序

自中国 1978 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官方农村正规金融如农业银行、农信社等机构不仅因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而举步维艰,还大幅收缩其在农村地区的分支机构,存在明显的“去农化”趋势,其支农效果也越来越弱。与此同时,在农村正规金融市场之外,自发生成了一块由友情借贷、关联性借贷、合会、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地下钱庄、高利贷组织等构成的农村非正规借贷市场,尽管官方多次对其打压、取缔,但种种迹象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不仅有日趋繁荣之势,尤其是在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而且还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保持了极低的违约率。事实上,诸多的实践调查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确实在农民收入增加、农业增长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有人把中国经济 30 年的持续增长归功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这就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深入思考,缺乏官方产权保护的民间借贷契约缘何具有较高的执行效率,或者说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具有怎样的治理机制从而长盛不衰,农村非正规金融又是如何演变的?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是默认其继续存在还是引导它走向正规?显然,对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为中国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建构提供理论指导,就其实践意义而言,还有利于解决“三农”融资难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或许还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处在转型期的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及实践经验。

本书从农户的视角切入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的研究,并且将研究范围限定在 1978 年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农户参与非正规金融的活动及行为。值得强调的是,在本书的经验研究部分重点运用案例研究法来剖析农村

非正规金融发展中的各类经典问题。当然,为了能刻画出真实世界里的农村非正规金融之复杂图景,本书研究或通过田野调查,或通过史料搜集与整理,或走访案例当事人,从而使这些案例“故事”不仅最大限度地展现了真实世界里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现象,表征出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未来走势,进而为“三农”融资难问题提供政策启示,甚至还印证或拓展了制度经济学中的若干经典理论。

在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本书研究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农户偏好于从非正规金融市场借款是出于成本收益的算计,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越贫困的农户越偏好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这就意味着,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贫困及中低收入的农户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选择非正规金融市场融资是经济理性的,符合“理性小农”的行为逻辑。

第二,资本要素价格的变动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初始条件,能有效降低借贷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基础,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必要条件则在于该制度的创新者能预算到进行制度创新的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地方政府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外部推力,而现有体制下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则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阻挠力量。

第三,民间借贷契约的私人治理首先要借助各种社会关系网络来传播信息,而信息的有效传播促成了村庄信任的建立,乡土社会的各种非正式制度构成了强道德约束,无限期的重复借贷博弈以及各种嵌入式的关联性交易都增强了借款者还贷的积极性,并提高了其违约成本,同时还能把高风险的借款人过滤掉,而灵活的担保机制又进一步降低了私人借贷的违约风险。

第四,当权力当局关于产权的界定不够清楚或很难界定清晰时,个人会以违法的方式攫取一部分置于公共领域的产权,而由于监管成本和信息成本过高,监管部门只能打击或肃清一部分非正规金融活动;另外,由于维持扭曲型二元金融体制的成本以及严禁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的费用

越来越高,国内的经济形势也提出了放松金融监管的要求,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监管部门执行原有金融抑制政策的力度终于降低了。

第五,地区性文化差异导致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地域差异性。地方政府为了增强对稀缺金融资源的控制会主动发起非正规金融制度创新,并充当非正规金融制度创新的重要组织者;当农村资金互助社在“地下”非法经营时,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但在获得合法地位后其制度效率反而下降了。

第六,外部宏观经济环境促使我国权力当局改变对待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政策偏好进而降低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嬗变的成本,而在内生逐利动机驱动下有一部分愿意合法化的非正规金融响应了新的盈利机会,会借助或利用各种关系资源实施合法化转型。不过,中国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仍面临着诸多障碍。

第七,本书研究得出的主要政策启示有:赋予农户自由契约权,并消除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法律壁垒;精简约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规则进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非正规金融正规化后的成本;有必要借助财政手段与税收杠杆来加强对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支持力度,同时还要建立科学完善的监管体系;通过财税政策激励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实现联结,还要为成功转型的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立退出机制。

笔者

2014年8月

目 录

第1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1
1.2 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对象	4
1.2.1 核心概念界定	4
1.2.2 研究对象	6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7
1.3.1 研究方法	7
1.3.2 研究内容与结构	9
1.4 本书的创新之处	14
1.5 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	16
1.5.1 小农命题:经典理论与当代现实	16
1.5.2 对小农性质的进一步思考	21
1.5.3 小农命题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	24

第2章 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的文献综述

2.1 国内学者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理论研究	28
2.1.1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	29
2.1.2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31

2.1.3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研究	32
2.1.4 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	34
2.1.5 基于管制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36
2.1.6 评论	38
2.2 国内学者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实证研究	40
2.2.1 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若干特征化事实的考察	41
2.2.2 对农村非正规借贷运行特征的考察	44
2.2.3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47
2.2.4 评论	49
2.3 国外学者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	51
2.3.1 农村非正规金融:生发逻辑、规模测度及功能	52
2.3.2 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微观机理的研究	55
2.3.3 政府干预主义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影响	62
2.3.4 评论	65

第3章 融资需求、农村金融供给与农户融资偏好

3.1 中国农户的融资需求	68
3.1.1 农户融资需求的种类	68
3.1.2 满足农户融资需求的各类渠道	69
3.1.3 不同类型的农户融资需求的差异	70
3.1.4 不同地区的农户融资需求的差异	72
3.2 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供给	74
3.2.1 农村正规金融的总体概况	74
3.2.2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支农状况的具体考察	78
3.2.3 一个总括性评论	84
3.3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供给状况	85
3.3.1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不同形态	85
3.3.2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模测度	90

3.4 农户偏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动因: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91
3.4.1 农村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借贷行为的逻辑	93
3.4.2 基于 Straub 模型分析农户缘何偏好农村非正规金融	95
3.4.3 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及命题的进一步引申	99
3.4.4 小结	102
 第4章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逻辑	
 4.1 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政策背景及其转向	104
4.1.1 计划经济时期的强金融管制策略(1952—1978年)	105
4.1.2 转型期的金融抑制政策(1979—2002年)	106
4.1.3 金融抑制政策的松动与金融“新政”的实施 (2003—2010年)	108
4.2 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动因、推力与阻力	119
4.2.1 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内在动因	120
4.2.2 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外部推力: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	126
4.2.3 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128
4.3 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中的合法化约束	130
 第5章 农村民间借贷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	
 5.1 农村民间借贷契约治理的微观机理	135
5.1.1 内涵界定	135
5.1.2 民间借贷契约治理的信息传递机制与村庄信任机制	136
5.1.3 民间借贷契约治理的动态博弈过程	138
5.1.4 民间借贷契约治理的灵活担保机制及强道德约束	143
5.1.5 一个总结性评论	145
5.2 外部冲击对农村借贷契约治理机理的影响	145
5.3 民间借贷契约治理的进一步剖析:以合会为例	151

第6章 农村非正规金融助推农户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

6.1 农村非正规金融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及相关假说·····	157
6.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159
6.3 对关键变量的处理·····	160
6.4 计量分析·····	164
6.4.1 平稳性检验·····	165
6.4.2 格兰杰因果检验·····	167
6.4.3 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169
6.5 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业产值的贡献测度·····	171
6.6 小结·····	174

第7章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案例研究:自中国经验观察

7.1 产权界定、市场禁入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由方兴钱庄兴衰 引发的思考·····	176
7.1.1 基于方兴钱庄个案的考察与思考·····	177
7.1.2 农村非正规金融缘何屡禁不止:基于产权理论的经济解释 ···	182
7.1.3 对金融市场禁入政策松动的一个新解释·····	185
7.1.4 产权再界定、租值耗散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外部性 ·····	188
7.1.5 小结·····	192
7.2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中的文化因素:来自项东村的个案研究 ·····	193
7.2.1 文化塑造制度演进的机理分析·····	196
7.2.2 地方亚文化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演化:基于浙江项东村 的个案考察·····	202
7.2.3 小结·····	208
7.3 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创新的另一种方式:以农村合作基金会 的兴衰为例·····	209
7.3.1 已有研究回顾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210

7.3.2	基于新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分析·····	214
7.3.3	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创新中的政治博弈·····	219
7.3.4	关于农村合作基金会兴衰(1984—1999年)的案例探讨···	224
7.3.5	小结·····	228
7.4	农村非正规金融转型中的制度创新:以富平小额贷款公司为例·····	229
7.4.1	对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个案考察·····	231
7.4.2	农村非正规金融向农村正规金融的嬗变·····	237
7.4.3	富平模式的可持续性 & 经验启示·····	241
7.4.4	小结·····	245
7.5	农村非正规金融对金融“新政”的响应:基于2个村的个案研究···	247
7.5.1	由金融“新政”引发的问题·····	247
7.5.2	两个村建构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故事·····	249
7.5.3	农村资金互助社合法化的“悖论”:基于交易费用 理论的解释·····	253
7.5.4	破解“悖论”之策·····	257
7.5.5	小结·····	259

第8章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现实取向

8.1	引言·····	261
8.2	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必要性·····	263
8.3	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约束条件·····	267
8.4	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动力因素·····	270
8.5	中国的实践与外部经验借鉴·····	273
8.5.1	中国的实践·····	273
8.5.2	外部经验的借鉴与启示·····	276
8.6	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模式选择·····	278
8.6.1	农村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化的模式·····	278
8.6.2	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模式·····	282

8.7 政策建议	285
----------------	-----

第9章 结论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9.1 主要结论	288
9.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94

参考文献

索引

后 记

图目录

图 3-1	农业信贷与农业产值	76
图 4-1	1978—2009 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率	110
图 4-2	1978—2009 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	111
图 4-3	中国历年投资率、消费率及净出口比重的走势	112
图 4-4	中国金融机构的贷差(1978—1994 年)	113
图 5-1	农村民间借贷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	135
图 6-1	融资约束无效时农户的最优投资决策	157
图 6-2	存在融资约束时农户的最优投资决策	158
图 6-3	农业产值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年度趋势变化	164
图 6-4	变量的时间序列趋势	165
图 6-5	农村非正规金融人均规模的结构冲击引起的农村人均 收入的响应函数	170
图 7-1	金融抑制政策执行的成本与收益	186
图 7-2	不同文化状态下的制度可能性边界	201
图 7-3	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最优规模	256

表目录

表 3-1	满足农户融资需求的两种渠道	70
表 3-2	不同收入层次农户借款用途的差异	71
表 3-3	农村资金与农业资金通过金融渠道的流出量(10 亿元, 以 2000 年价格计算)	75
表 3-4	农业信贷与农业产值	77
表 3-5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各种形态	86
表 3-6	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的测度	91
表 5-1	借款者与放款者的有限博弈	139
表 5-2	关联博弈下的收益矩阵	142
表 6-1	变量定义	160
表 6-2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模	162
表 6-3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估算结果	162
表 6-4	单位根检验的结果	166
表 6-5	农业增长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因果关系检验	167
表 6-6	农民收入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因果检验	168
表 6-7	人均收入与人均融资额的回归结果	169
表 6-8	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	170
表 6-9	影响农业产值的若干因素	171
表 6-10	影响农业产值各因素的计量结果(1981—2008 年)	172
表 8-1	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四种模式	280
表 8-2	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模式	284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经过 30 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三农”领域已取得了一些关键性突破,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农村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展,农村医疗体制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同时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农产品供给短缺的状况初步得到了改善,主要农产品产量实现了供求平衡,丰年有余。这些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农业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仍未改变,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也未消除,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而且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的收入仍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

总之,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依然较艰巨。对于中西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局面依然长期存在。显然,“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不仅关系到能否实现我国现代化,进而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也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确实牵涉到绝

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回避该问题。

事实上,要解决我国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即减少农民的数量;二是增加农村的发展资金。显然,若能顺利实现“走出去、引进来”,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要想大批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户籍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等,而最关键的是城镇地区能为剩余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显然,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在短期内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我们在短时期内能够做好的是解决“引进来”的问题,即引导外部资金以及农村资金流入农村地区与农户之手。

但问题是,农业是一个深受自然力与气候环境影响、高风险与低积累率并存的天然弱势、弱质性的产业,对外部资金缺乏吸引力,而且农村地区的投资环境差,很少有人愿意到农村地区投资。雪上加霜的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非但没有发挥配置农村资金的作用,还充当了农村资金外流的“抽水机”,使农村资金的供求缺口更大,农村资金外流和非农化的趋势也越发严重,农村金融服务特别是针对贫困农户的贷款服务极度匮乏。这就是经济领域内的“马太效应”。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政府通过对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公有性质的正规金融机构进行业务管制进而使其积极主动地向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并于1994年成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门开展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但事实表明,我国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干预基本以失败告终,单纯地依靠对正规金融机构实施业务管制不仅难以阻止农村资金流向城市、流向高收益产业,还使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发生扭曲,并积累了极高的不良资产,而绝大多数存在借贷需求的农户及中小企业依然面临着“融资难”问题。尽管此后官方还依托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开展了小额信贷项目,但这不过是杯水车薪。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资金需求者与资金的富余供给者自发建立了各种非正式的融资渠道,如基于血缘、地缘及业缘关系的民间私人自由借贷、贸易借贷、银背、地下私人钱庄、合会、基金会、典当行、团体内集资、民间贴现、高利贷等,这不仅有效满足了农村资金的需求,进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且还对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产生了

市场竞争压力,逼迫其主动改革,进而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配置效率。不过,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由于缺乏有效控制风险的手段,容易放大金融风险,引起金融恐慌;非正规金融机构缺乏合法性,其权利得不到保障;其规模太小,无法延伸其业务范围;由于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非正规金融时而采取一味封杀的政策,时而采取默许的态度,其生存的外部环境不稳定,难以发展壮大。

这就引起了学者们的进一步思考,缺乏法律保护的非正规金融为什么深受农户的欢迎?它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与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有什么样的特殊运作机制使其长盛不衰,或者说该制度安排具有经济效率吗?它与正规金融的关系是怎样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否会随着政府干预的兴起而衰落?非正规金融演变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是允许非正规金融继续存在还是引导它走向正规,又如何控制非正规金融的风险,以及如何低成本地实现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连接?显然,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从事历史与逻辑的角度重新进行深入探讨。

显然,若承认“引进来”问题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举足轻重,那么,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变革现有的农村金融体制,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体系。而且,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确实能够有效地促进非农资金流入涉农领域,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农村系统内部资金的配置效率,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对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为我国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体系的建构提供理论指导,就其实践意义而言,还有利于解决“三农”融资难问题,促进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

此外,就该研究课题的理论意义而言,对非正规金融的研究有助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即非公有制经济是如何在正规金融融资极其有限的约束下却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演化过程进行剖析,还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体制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以及从人格化交易向匿名交易转化过程中各类市场主体所遭遇的冲击及其反应;更为重要的是,对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的研究还能